

評黃道炫，《鐵水流——戰時中共革命系統的運作，1937-1945》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4，473 頁

楊秋雨*

「解釋是歷史的生命血液。」¹人們對於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一直沒有停止追問。紛繁見解之中，能夠深入探究中共革命運作獨特性的研究並不多見。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黃道炫，繼中央蘇區的研究之後，²聚焦全面抗戰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發展史，《鐵水流：戰時中共革命系統的運作，1937-1945》即是其研究最新集結。

作者認為：「中共政治文化生發的力量很難以量化方式展現，卻在中共崛起與發展進程中不可忽略。」（引言，頁 xi）對於捕捉並解釋這股微妙力量，作者選擇從系統性的視域看待中共的政治文化和革命實踐：「中共革命既在系統之中運作，又在不斷造就、生成系統。系統運作本身，就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引言，頁 xvii）由此出發，黃道炫希

*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近代史系碩士研究生

1 E.H.卡爾(E.H. Carr)著，陳恆譯，《歷史是什麼？》（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頁 113。

2 黃道炫，《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望超越細節和常識，力圖深入革命的內在肌理和血肉呼吸，深描中共獨特政治文化和政黨氣質的形塑過程。

除〈引言〉和〈結語〉外，本書由分為三個部分的十一個章節組成，分別從規訓(幹部)系統、貫徹系統、抵抗系統逐步開展論述。這三者「自成系統，其實又相互影響。規訓系統培養幹部，有助於貫徹系統的運行，幹部系統和貫徹系統的有效推進，是抵抗系統得以成立的基礎，而抵抗系統的運作，又要求幹部系統和貫徹系統的提升」(引言，頁 xvi-xvii)。

第一部分「戰時中共的規訓系統」包含三個章節，聚焦中共培養幹部、鍛造革命者的環環相扣的系統工程。〈幹部養成的路徑〉細緻發掘日記、思想彙報等具有個人色彩的史料，體察「三八幹部」在個人、群體和政黨機器多方互動中的養成過程。〈婚姻限制下的掙扎與皈依〉承接上一章節對「三八幹部」的關注，以戰時婚姻管控為切入點，透視中共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影響。〈整風運動的心靈史〉從心靈史的角度，對整風運動進行考察。

第二部分「戰時中共的政策和貫徹系統」由四個章節組成，從不同側面深描抗戰時期中共逐漸形成的政治氣質。〈權力的垂直下探〉聚焦中共戰時權力下探的過程和意義，並討論中共在具體工作和思考中的「章法」。〈群眾組織及群眾路線〉勾勒中共「軟的政治文化」，即以群眾路線為核心，藉水平拓展的系統模式，與組織和權力的垂直下探形成互補，賦予中共在政治上的彈性。〈政策落實〉選取中共政策落實機制中的幾個關鍵環節作為觀察的樣本，討論中共高度的執行力和貫徹能力的來源。〈統一戰線的地方形態〉以中共在河南密縣的活動為中心，論述統一戰線政策如何因應地區性特殊因素。

第三部分「戰時中共的生存和抵抗」的四個章節，以生存為關鍵詞，闡述中共於敵後戰場的獨特戰爭形式和意義。〈出師華北〉論述

抗戰初期複雜的戰爭生態中，中共在華北擴展勢力的戰略和實踐。〈持久戰的「三駕馬車」〉討論中共以游擊戰、根據地、正規軍三者並重，形成持久抵抗的力量。〈弱平衡下的根據地生存〉顯示中共與日軍對峙和與國軍相生相殺的複雜周旋之中，根據地在「弱平衡」中堅持抵抗和生存的策略和邏輯。〈抵抗系統的隱喻：地道和地道鬥爭〉連綴考察中共系統抵抗的各個環節和戰時環境，以冀中地道鬥爭的個案透視了敵後戰爭能夠持久抵抗的歷史因果。

本書既繼承近年研究潮流，也對某些趨勢提出反思。新世紀以來，中共黨史研究日益廣闊和深入。³源自西方的新文化史也波及中共研究，⁴並在此後大陸學界激起重要反響。同時，西方的中共黨史研究開始走向地方化。⁵在此潮流中，學界的眼光轉向細微之處，強調中共對地方因素的因應和適應，導致輕視甚至忽視中共組織和意識形態力量的傾向。⁶地方化或區域性研究頗具活力，近年不少學者著力於此，⁷

³ 周錫瑞，〈把社會、經濟、政治放回二十世紀中國史〉，收入劉東主編，《中國學術》，第1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頁201-215；裴宜理，〈重訪中國革命：以情感的模式〉，收入劉東主編，《中國學術》，第8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頁97-121。

⁴ 裴宜理著，閻小駿譯，《安源：發掘中國革命之傳統》（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4）；丸田孝志，《革命の儀礼——中国共産党根拠地の政治動員と民俗》（東京：汲古書院，2013）；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紅星」是怎樣升起的：毛澤東早期形象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

⁵ 陳耀煌，〈從中央到地方：三十年來西方中共農村革命史研究述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68（臺北，2010），頁143-180。

⁶ 陳耀煌，《統合與分化：河北地區的共產革命（1921-1949）》（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頁6、9。

⁷ 例如：阿南友亮，《中國革命と軍隊：近代広東における黨・軍・社會の關係》（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12）；Jeremy A. Murray, *Chinas Lonely Revolution, The Local Communist Movement of Hainan Island, 1926-1956*

有望在未來持續成為學術增長點。

自 2010 年以來，「新革命史」潮流蔚為大觀，⁸不僅繼承了大陸學界對革命史的關懷和社會史潮流，也形成對國際學界中共研究新進展和新趨向的回應。在「新革命史」的影響下，新文化史、⁹技術史，¹⁰以及環境和地理等視角的出現，¹¹都極大程度更新了看待黨史的方式，並與國際學界的進展相互激蕩。近年來，部分研究以人物傳記的形式，考察中共的百年歷史進程，並在書寫中增加了女性史、全球史的新視角。¹²還有學者撰寫中共百年革命歷程的通史，¹³嘗試以連貫的視野深化對於中共的認識。另一些研究從具體的區域或文本切入，探討關鍵問題。趙諾藉深描太行根據地幹部成長的歷史進程，勾勒歷史細節，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7); 周錫瑞著，石岩譯，《意外的聖地：陝甘革命的起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等。

⁸ 有關「新革命史」的討論眾多，恕難一一列舉。代表性論著可參考李金錚，《重訪革命：中共「新革命史」的轉向》(香港：開明書店，2023)。

⁹ 張智超、鄧紅，〈新文化史視域下中共革命史研究的十大議題〉，《中共黨史研究》，2023：4(北京，2023)，頁 122-139。

¹⁰ 齊小林，〈技術史：中共革命研究的進路〉，《黨史研究與教學》，2022：5(福州，2022)，頁 37-44。

¹¹ 李金錚，〈中共抗戰的生態環境解釋〉，《抗日戰爭研究》，2023：3(北京，2023)，頁 4-33；程森，《戰爭狀態下的人與自然：華北根據地環境史研究(1935-1949)》(濟南：齊魯書社，2023)；郭寧，〈革命與空間：中共黨史研究的地理學視野〉，《黨史研究與教學》，2022：5(福州，2022)，頁 45-50。

¹² Timothy Cheek, Klaus Mühlhahn, Hans van de Ven ed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 Century in Ten L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¹³ 高橋伸夫，《中國共產黨の歴史》(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21)；Tony Saich, *From Rebel to Ruler: 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1)；石川禎浩著，瞿艷丹譯，《中國共產黨百年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23)。

打撈了諸多革命中幹部的個體情況，透視中共政治力量成長中的曲折和錯雜。¹⁴桑兵以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為切入點，將黨史經典文本放入歷史語境中解析其來龍去脈。¹⁵

中外學界嘗試疏離中共的意識形態原則來看待中共的歷史，甚至刻意針對黨史中的宏大敘述進行解構性研究。然而，中共具有極強的信念理想，深受集體主義和辯證思維等意識形態因素影響，對意識形態因素保持距離，史家可能難以揣摩這支力量的歷史根源。與解構性研究相表裡的還有幾點趨勢。首先，學者不斷以新視角來觀察中共，不論是系統的視角，還是從心靈史切入研究，亦或是對權力運作機制的觀察，都可見晚近史學潮流和社會科學對本書寫作的影響。其次，不論是地方化研究還是「新革命史」影響下的學術實踐，都更為關注革命過程中的複雜和曲折，著重中共對社會、文化等因素的因應。以致於在擴展研究視野的同時，反而分散了對中共自身特質的注意。最後，近年中共黨史學界對於「碎片化」問題亦有所關注。¹⁶如今學界對於中共在各地活動的地方性知識瞭解越來越全面，對於中共的行事和組織有多元角度的觀察，卻越來越難以建立對於中共特質的整體性認知。本書正是對上述研究取向的因應，試圖超越細節和局部，尋求對於中共獨特氣質和革命運作的整體、系統的觀察。

本書不僅關注中共的行動和歷史過程，更要挖掘背後蘊藏的歷史深意。應星指出：「中國共產黨首先是一個意識形態色彩濃厚的現代政

¹⁴ 趙諾：《太行山上：中國共產黨太行根據地幹部政治成長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3）。

¹⁵ 桑兵：《大處著眼：持久戰與「論持久戰」》（北京：中華書局，2024）。

¹⁶ 孫會修，〈中共早期制度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收入馬敏主編，《近代史學刊》，第21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頁256；應星，〈究竟何為重要的中共黨史研究——「碎片化」問題再思考〉，《中共黨史研究》，2024：6（北京，2024），頁29-35。

黨組織，各種實證研究最後都無法迴避對其意識形態的學術闡釋。」¹⁷因此，考察這樣一個深受馬克思主義、集體主義形塑的政黨，應當對其意識形態原則建立歷史化、語境化的理解，黃道炫無疑深諳此道。

抗戰時期毛澤東(1893-1976)指出：「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¹⁸本書的第一部分細緻考察戰時幹部群體的成長過程，刻畫中共政黨氣質和思維方式如何形成。借助日記、回憶等材料，作者深入發掘個體心靈深處的回響和感受，並將之與政黨、組織、集體聯繫起來，考察意識形態特質如何浸潤革命參與者。

從戰時婚姻管控切入考察，尤能切中中共政治文化關鍵。愛欲是人類基本的情感和慾望，但在革命陣營中，幹部「非常重視集體利益，非常重視自身情感是否符合革命陣營的期待」(頁88)。愛情、婚姻等私人問題面臨嚴格且強大的約束力量。中共的特殊之處在於，其組織兼具懲戒者和責任者的身份，「組織不再是個體的對立物，而是內化進每一個個體，組織作為一個系統，讓個體生命融入其中。」個體形成對組織的依靠和服膺，化解了個人欲求(頁90、91、96)。個體面對人類的基本慾望時會有動搖、掙扎和反覆，「黨性中的組織皈依和個性中的自我滿足，既糾結又交融，前者不斷在克服後者，後者在不斷倒向前者的過程還不時會冒出頭角」(頁99)。個體內心的反復拉鋸，映襯出小我走向大我過程中的錯雜斑駁。

整風運動中，個體要成為「對黨完全忠誠的透明人」(頁107)，更可見心靈受到的深度攪動。相較於組織運作摧折萬端的強勢外力，「更主要的還在於自我改造，外在壓力必須內化於自覺自願，這是中共黨

17 應星，〈「以史解經」與中國共產主義文明研究的整全性路徑〉，《開放時代》，2021：4(廣州，2021)，頁29。

18 毛澤東撰，竹內實監修，《毛澤東集》，第6卷(東京：蒼蒼社，1983)，〈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1938年10月)，頁250。

人政治文化的關鍵，也是整風運動的關鍵」(頁 115)。因此，在一系列的自我反省、集體鬥爭之中，共產黨員經歷的並非簡單的從抵抗到馴服的單線過程，更可能「是他們如何說服自己，從有條件信任到無條件獻身」(頁 142)。周恩來(1898-1976)談到延安審查幹部、檢查特務時，說：「一些歷史不清或者是說了假話的年輕人，曾經有一度的波動。說假話，這是中國舊社會所造成的。在過去的社會裡，你不說假話就不能生存。你不跟他說假話，他反倒不信任你，你跟他說幾句假話，他才信任你。」¹⁹革命運動的進行深刻回應了「中國舊社會」的痼疾，預示著革命更為深廣的影響。

上述考察顯示了中共革命的精神深度，揭示出革命對個體意義世界和生活世界的徹底改造。這樣的改變也深刻影響著一個個幹部的革命實踐，提升了他們的能力(頁 27)。作者展示出馬克思主義、集體主義、系統性思維在中共改造心靈的過程中如何浸潤著幹部。他借助當時的工作報告和文本，呈現出幹部看待問題時的辯證思維和系統觀念，證明了中共幹部培養的獨到之處(頁 57-64)。再如中共權力下探過程中，幹部亦注重「處事的條理性和系統性，權力運用講究章法」(頁 183)。類似的觀察揭櫫出中共政治文化周流全身、深入骨血的強大能量。

對於規訓系統的考察，尋究了中共系統運作深入人心、撼動心靈的力量，顯示其剛性的一面。在戰時環境之中，中共又充滿靈活變通的能力，有「更具彈性的運作機制，擁有更大的靈敏度」(頁 154)。作者對於學界研究眾多的群眾路線、統一戰線等核心議題，提供了新的解讀。

戰時中共根據地的政治文化，由垂直下探的權力體系和水平式的

¹⁹ 周恩來，〈談談學習問題〉(1950年4月27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四年匯編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頁 57。

群眾路線，一縱一橫交錯輔助構成。根據地的權力下探，既需要軍隊武裝支持下的黨和政權的快速落地，又需借助統一戰線，利用和改造原有的鄉村結構和體系，「政治力量以空前強勢的姿態進入社會，承擔起社會改造的責任」（頁 188）。權力下探形成嚴密強力的控制能力，也帶來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的挑戰。群眾路線的政治文化，很好地中和了權力下探帶來的問題。「群眾路線把黨和群眾擺在水平位置，通過向群眾釋放權利，以同心圓式的不斷推展和融合拉近黨和群眾之間的聯繫。」（頁 191）形成扁平導向的政治文化。分別看待權力下探和群眾路線，其意義都不明顯。作者將二者的關聯呼應揭示出來，其意義和作用更加顯豁：

正是有了垂直下探的權力體系，有了深入到民眾之中的幹部體系，群眾路線的推進才有了更為有力的載體。垂直下探的權力體系，固然有可能造成等級森嚴的控制體系，卻也可能形成政治權力水平拓展的基礎，在基層尤其如此。（頁 211）

有了上述橫縱兩條線索的鋪墊，中共政策順暢貫徹的諸多面向也就易於理解了。作者認為：「抗戰時期，中共的權力下探和群眾路線結合，權力運作更為柔軟；調查研究及數目字管理的興起，讓政策制定和貫徹更加切實；加之統一戰線帶來的彈性，政治系統空前多元，這可以說是中共最具活力的時代之一。」（頁 295）深刻體現出中共政策落實之中系統運作的特徵。這也讓中共在敵後的生存和抵抗成為可能。

敵後戰場一直是學界研究的中心議題。但如何深入理解敵後戰場特殊的戰爭形式和獨特貢獻，尚待推進。敵後戰場「最重要的關鍵詞就是生存，生存是理解中共敵後戰場的鑰匙」（頁 298）。生存不僅僅是軍事鬥爭，還是牽涉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層面的總體戰和系統性工程。

頑強生存背後是中共武裝具有的堅強素質：「團體意識、紀律觀

念、信仰追求在潛移默化中得到灌輸、提升，是中共武裝常可在困境中生存的關鍵，也是八路軍分而不散的關鍵。」(頁374)這樣的特質與中共的權力下探和政策貫徹機制合力，使得八路軍在華北造就了根據地和更強大的武力，而且壯大了黨的力量，又能反饋根據地和武裝的發展(頁376)。

面對強大的日軍，中共雖然在軍事上處於劣勢，但仍能和日軍在華北敵後「形成一種弱平衡局面：強勢的一方似乎足以打破平衡，卻又沒有足夠決心打破平衡，不得不無奈接受，雙方間的平衡搖搖欲墜，卻總能維持不倒」(頁384)。因此，在作者看來，處於弱平衡之中，中共不能一味示弱而放棄鬥爭，也不能過分刺激敵人(頁398-399)，其軍事鬥爭力道的掌握常要在瞬息萬變之中靈活應對。

不過，策略和靈活並不能完全解釋中共的抵抗。堅持並生存下來，意味著一切可能。如中共的「隱蔽發展策略」，以扎根為主要訴求，「著眼於全方位的政治、經濟、社會的滲透，著眼於力量向民眾的深植」(頁401)。表面上不露聲色，實際在悄然積蓄力量，其中蘊含著宏遠的革命藍圖。看似被動、險象環生的地道鬥爭，也顯示「中共的抵抗綿里藏針，以各種方式、不放過一切機會持續進行」(頁451)。中共堅韌編織而成的抵抗系統在敵後戰場的扎根發展，其間的得失進退難以用常規衡量戰爭的方式評估。

本書呈現了某些中共政治文化和革命運作的關鍵，提供了超越地方情境的觀察。如果從更深層次追索，以下幾點或值得進一步思索。

首先，中共系統運作中內部的差異和互動，在本書的考察中似有所忽視。中共政黨氣質和政治文化的形成並非一時一地，不應忽視的是這個過程伴隨著各個地方不同經驗的融匯、交流和反饋。理解中共氣質形成的具體過程，仍有必要關照中共革命作為一場「地方革命」

的複雜面向。²⁰一方面，中共政黨氣質和政治文化如何在各種地方語境之中流轉和落實，如何與各種結構性甚或偶然性的因素呼應，都是令人好奇的問題。另一方面，根據地情形各不相同，不同地方的章法在融匯和交流後，進而反饋整個體統，成為形塑中共整體的因子。叢小平的研究揭示出在隴東的婚姻糾紛中產生的「馬錫五的審判方式」，其作為能夠反饋整個司法體系和革命實踐的資源，對革命產生深遠影響。²¹

其次，本書深入中共內部追蹤蘇聯因素的線索和源流，顯示出蘇聯對中共的深刻影響。如中共對於學習、訓練的重視與蘇聯和共產國際就有密切關係(頁18)，中心突擊、勞動競賽的模式也源自蘇聯(頁240-241)。不過，書中卻較少追索從蘇區時期到抗戰時期中共歷史經驗的傳遞和連繫。作者曾提到：「作為中共首次獨立領導的革命運動，蘇維埃革命基本奠定了中共武裝革命의思想和邏輯基礎，……中共革命的幾個重要原則諸如武裝鬥爭、群眾路線、土地革命、社會再造等，在這一時期已經牢固確立。」²²這段話精準道出了戰時中共所能憑藉的歷史資源。中共革命重心由南向北的轉移，其中歷史經驗的延續、傳遞、更新和反思值得進一步發覆。

抗戰是中共政黨氣質形塑的關鍵時刻，戰時的幹部如何汲納蘇區時期的歷史經驗，抗戰前的發展經驗對中共政治文化的形成到底有何影響等問題，本書還難以清晰解答。王龍飛注意到革命經驗面臨代際、

20 Tony Saich, "Introduct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Anti-Japanese War Base Areas," *The China Quarterly* 140 (December 1994): 1006.

21 叢小平，《自主：中國革命中的婚姻、法律與女性身份(1940-196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

22 黃道炫，《張力與限界》，頁2。

地域間組織和革命陣營內的不同群體之間的傳遞問題。²³忽視對這些層次的關注，恐怕也會影響學者對於戰時中共政治文化的判斷。既有研究容易看到抗戰時期中共的靈活和妥協，而不易察覺其背後一套堅強的原則，也多少與學者們忽視此前革命探索經驗有關。劉少奇(1898-1969)說：「我們黨必須有原則上的嚴肅性，但在實施原則時的具體工作中又必須有高度的靈活性。」²⁴原則一以貫之，環境變化之中則需要變通和靈活。中共不僅要面對戰時環境的影響，還有豐富堅韌的革命鬥爭經驗和歷史教訓可以利用和反思。如何評估這些因素對中共政治文化形成的具體影響和發揮影響的方式，是無法迴避的問題。

如本書所言：「中共思想統一不僅僅在於壓倒了外面世界的話語，而且建立了自己的思想邏輯，這樣的邏輯如流動的鐵水，軟軟卻不由分說地漫過，水過處，凝結的即為堅硬的意志。」(頁67)這樣一股勢如破竹的力量，其強勢前進之中所具有的慣性和帶來的後果，往往歷史的當事人和行動者也無法完全控制和預料。鄧小平(1904-1997)後來說：「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²⁵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1912-1992)曾提出：「如何使得革命真正成功而避免不應有的損失，在這方面注意得太少，不注意調查研究，不注意總結經驗教訓。」²⁶其間的歷史動因仍值得不斷覃思，本書可以說盡了相當大的努力，在

23 王龍飛，《全民皆兵：太行根據地的武裝體系(1937-1945)》(北京：商務印書館，2024)，頁83、94。

24 劉少奇撰，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黨校編，《劉少奇論黨的建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論黨〉(1945年5月14日)，頁498。

25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頁333。

26 胡喬木，《胡喬木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對《歷史決議》學習中所提問題的回答〉(1981年9月14日)，頁170。

這方面做出深刻而全面的探索。

每一代人都會以不同方式看待歷史，但無論如何，「關注並修正公共神話是每一個時代的要務，不僅是我們這一時代」。²⁷對於中共黨史研究者來說如此，對於中國近代史乃至一切歷史研究者又何嘗不是如此？

(本文於 2024 年 12 月 24 日收稿；2025 年 3 月 13 日通過刊登)

*拙文承蒙吳敏超老師、譚徐鋒老師指正，匿名審稿人提供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²⁷ 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Hardy McNeill)著，高照晶譯，《追求真理：威廉·麥克尼爾回憶錄》(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頁 138。